

国家、体系与地区秩序

——评《国家、民族与大国：地区战争与和平的来源》

左希迎

内容提要 冷战后,随着国际体系的变迁,地区安全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各种新的地区安全理论层出不穷。在这其中,针对不同地区是否倾向于战争,本杰明·米勒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模式,认为大国介入的类型和国家—民族是否均衡是决定地区战争和平的关键因素。然而,米勒的理论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无法解释为何冷战后东亚能够维持和平;国家—民族均衡和民主化很难保证国家之间的高层次和平;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只能减缓地区战争与冲突,无法保证地区永久和平。

关键词 国家—民族均衡 地区战争 大国介入类型

自国际关系学科奠基以来,战争与和平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如何从纷繁复杂的因素中提取少数简单有力的变量,建立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精致解释模式,这也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难题。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导致战争与冲突的因素很多,因果关系繁杂,所以解释模式也多种多样。冷战后,国

《国际政治科学》2008/4(总第16期),第120—133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际体系从两极转变为单极,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几率明显降低,而地区冲突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我们对世界上的各个地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各个地区的秩序不尽相同,战争与和平的模式也不尽一致,如何解释地区之间的国际秩序差异成为学术界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解释地区冲突水平差异方面,本杰明·米勒(Benjamin Miller)的新著《国家、民族与大国:地区战争与和平的来源》是学术界近年来难得的一本好书。在本书中,针对战争与和平的地区差别,本杰明·米勒集中关注外部大国与区域内国家的互动,特别着墨于国家内部国家与民族是否均衡对地区和平与战争的影响。由于变量选择简单有力、理论论证严谨、分析框架简洁明了,本书的解释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有着较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因而,这一新著对我们理解与窥测地区冲突与和平的原因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的问题

随着冷战结束,国际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两极结构转变为单极,美国实力一支独大意味着大国间的冲突概率显著下降。与此相对,不同地区的状况复杂而多样化,原先被大国竞争掩盖的地区矛盾浮出水面,地区冲突对全球秩序的冲击日益彰显。当前世界的现实是,不同地区的地区秩序差异颇大,有些地区陷入了长期动荡与冲突,另外一些地区则走向了区域一体化的道路,保持了高度的和平与繁荣。

针对体系变迁带来的地区秩序新变化,冷战结束前后,西方学术界对美国如何重新安排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辩论,为美国政

Benjamin Miller, *States, Na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Sources of Regional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府在核心区域的地区战略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讨论不仅从大战略的角度探讨如何保证地区秩序的稳定,如何护持美国霸权,同时在理论上对关系到地区和平与战争的一些因素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从整体上看,这些工作往往集中于对单个地区的研究,系统的跨地区比较研究并不多见,因此缺乏对不同地区差异性的宏观解释,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理论解释模式。

为什么有的地区出现了安全共同体,有的地区则没有出现?从学术界的研究来看,不同理论流派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不同的观点。建构主义侧重于强调规范和观念的影响,自由主义认为民主制度、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及国际组织是安全共同体形成的三个主要原因,现实主义则从霸权国和核武器的角度解释这一问题。然而,任何政治变迁都很难用单一的变量做出完美的解释,安全共同体出现的原因比较复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最主要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其他国家形成了安全共同体?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谋求构建一种综合交互的解释,整合各个理论流派的解释变量来回答这一问题,例如战争的高昂成本、价值观念、民主与身份、领土争端的消退等等。事实上,不管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这三个理论流派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一个地区如何从战争转向和平。有学者就指

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美国自身的大战略,及其如何安排欧洲、中东地区、东亚等区域的秩序。关于当时美国自身战略规划的探讨,参见 Robert J. Art, "A Defensible Defense: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5, No 4, 1991, pp. 5—53; Robert A. Pastor, "Preempting Revolutions: The Boundaries of U. S.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5, No 4, 1991, pp. 54—86; 对欧洲秩序安排的探讨,参见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1990, pp. 5—56; Stephen Van Evera, "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3, 1990—1991, pp. 7—57; F. Stephen Larrabee, "Long Memories and Short Fuses: Change and Instability in the Balka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3, 1990—1991, pp. 58—91; 对海湾地区秩序安排的探讨,参见 Lawrence Freedman and Efraim Karsh, "How Kuwait Was Won: Strategy in the Gul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2, 1991, pp. 5—41; Richard K. Herman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Rethinking U. S. Political Strategy after the Gul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2, 1991, pp. 42—75; 对东亚地区秩序的探讨,参见 Aaron L.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1993/1994, pp. 5—33. Richard K.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1993—1994, pp. 34—77.

详细的论述,参见 Robert Jervis, "Theories of War in an Era of Leading-Power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6, No 1, 2002, pp. 8—9.

出,以西欧为代表的发展道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转变是由现实主义的因素推动,主要是因为苏联威胁和美国霸权的存在;第二个阶段进入到一个比较恒定的和平与合作时期,主要是由自由主义的机制维持,包括民主政体和合作性国际机制。从以上两种解释来看,目前学术界的解释越来越倾向于综合不同理论流派的核心变量,在跨时间和跨领域两个维度重新整合,建立新的解释模式。

变量选择决定了对地区冲突与和平研究的成效大小,如何在不损害理论解释力的前提下保证变量的简单,这需要在两者之间达成一个平衡。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9·11事件”之后,非传统安全逐渐引起世界的注意,但是持续的地区冲突的存在意味着传统安全仍然是全球安全的核心。从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到不久前的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一系列地区冲突像幽灵一样威胁着世界安全。而在另一些地区,则保持着高度的和平与稳定,基本上消除了战争与冲突。

针对不同地区的战争倾向程度不同这一理论谜题,《国家、民族与大国:地区战争与和平的来源》一书谋求对此予以解答。米勒在书中主要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为什么有些地区特别倾向于发生战争,而其他一些则保持和平与稳定?地区战争与和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些原因是体系层次上的还是国家内部层次上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对理解当前的地区世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国家、体系与地区秩序

早在上世纪末,有学者就指出,由于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已经无利可图,战争在西方世界已经过时。然而,纵观世界,无论在西方的外围还是在非西方世界,地区冲突一直困扰国际社会稳定的难题。在传统上,对地区冲突的研究要

Norrin M. Ripsman, "Two Stages of Transition from a Region of War to a Region of Peace: Realist Transition and Liberal Endur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4, 2005, pp. 669—694.

Carl Kaysen, "Is War Obsolet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4, No. 4, 1990, pp. 42—64.

么关注体系层面的作用,特别是国家间的实力分配和国家对权力的追逐,要么关注国家制度的缺陷使国家行为外溢到国际社会,或者国内冲突引起地区动荡。针对学术界缺少贯通国际—国内两个层次因素的解释,米勒综合现实主义和其他理论流派的研究,将研究定位于体系和国内两个层次,融合不同层次的变量建构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式。在分析层次上,米勒谋求“填补现有文献的缝隙,通过更丰富的地区战争与和平理论平衡强调大国竞争的解释。”在关注大国竞争的同时,米勒也更加注重分析国家内部因素对地区秩序的影响。

(一) 核心变量

本书核心概念的选择体现了作者的研究思路,即统合国际国内两个层次的变量,将其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为了实现这一理论诉求,在国内层次上,米勒选定了国家—民族均衡(state-to-nation balance)为本书的自变量,国家的自由主义相容性(liberal compatibility)为干预变量;在体系层次上,米勒选取大国接触的类型为自变量。因变量是五种地区战争与和平的结果,分别是热战(hot war)、冷战(cold war)、冷和平(cold peace)、暖和平(warm peace),其中,暖和平包含常规和平(normal peace)与高层次和平(high-level peace)两种亚类型。

国家—民族均衡是米勒的理论框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意指一个地区的国家领土分界与这一地区人民的民族感情、政治认同的契合(congruence)程度。国家—民族均衡包含硬件和软件两个维度,分别指国家实力的限度和国家—民族的契合程度。国家实力的限度主要由国家制度和汲取资源的能力决定,如果国家制度能够强有力地控制国家暴力机器,并能够从社会中汲取足够的资源保证自我运转良好,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强国家(strong state),与之相对的便是弱国家(weak state)。国家—民族契合程度的高低主要由地区的现

分别参见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对国内制度缺陷影响国际冲突的探讨,参见约翰·伯顿:《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谭朝洁、马学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对国内冲突研究的研究综述,参见 Michael E. Brown, “The Causes of Internal Conflict: an Overview,” in Michael E. Brown et al.,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7)。

Benjamin Miller, *States, Na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s*, pp. 3—4.

Ibid., chapter 2.

有地缘政治边界与各民族的民族感情、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决定。地缘分界与人民认同错位造成国家—民族契合度低,这主要表现在一个国家存在多个民族和一个民族散布于多个国家两种主要形式。米勒认为,如果国家—民族不均衡,则意味着容易出现修正主义国家和“不一致国家”(incoherent state)。如果国家强有力,并且国家—民族契合程度高,这个国家则倾向于维持现状。自由主义相容性是指一个地区的国家是不是自由民主国家。米勒认为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管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有利于地区的凝聚与亲和。它作为国家—民族均衡的一个干预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区和平。大国地区接触的类型则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大国为了自我利益在地区内展开竞争;另一种是大国在地区内保持合作,以实现共同目的;第三种则是地区由单一的霸权主导。

对于地区战争与和平的类型,米勒首先把战争与和平的类型分为“热”和“冷”两大类,然后在此基础上细分为热战、冷战、冷和平、常规和平与高层次和平五种程度上依次递进的类型(见图-1)。其中,热战是指旨在运用武力消除对方军事实力的情形,在本书中,热战也包括有其他国家介入的内战。冷战则是指一种消极和平的情势,双方处于敌对状态,往往谋求宣示武力,并有可能演化为战争。冷和平则是各方达成正式协议,并保持着外交关系,这种情景的主要特点是各国之间不通过武力解决争端。常规和平则是一种战争可能性比



图-1 因变量:一个地区战争与和平的序列

资料来源: Benjamin Miller, *States, Na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Sources of Regional War and Peace*, p. 43.

Benjamin Miller, *States, Na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s*, pp. 19, 58.

Ibid., pp. 42—48.

对战争概念和测量的探讨,参见 Yoram Dinstein, *War, Aggression and Self-Def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rd ed., pp. 3—14; Paul F. Diehl and Gary Goertz, *War and Peace in International Rivalr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pp. 17—49.

冷和平更低的状态。高层次和平则体现为国家之间高度稳定与和平,不诉诸武力解决问题。

必须要说明的是,本书的自变量是有所侧重的,米勒一再强调,尽管大国对地区秩序有重要的影响,国家—民族不均衡仍然是地区战争的最根本原因。地区战争更多的根植于国内和地区层次,而非全球层次。国家能否从战争状态转变为高层次的“暖和平”,这根本上取决于地区和国内因素的推动。由于社会科学范围内的研究变量繁多,提取几个简单、解释力强的变量并非易事。关于地区冲突的研究涉及到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如何透过两个层次的繁杂表象,发掘深藏的客观规律,进而建立精致的理论模式,这需要避免选择变量过多从而增加建构理论的难度,同时不能过度简化变量以免影响理论的解释力。米勒在本书中选择体系层次上的大国地区接触类型和国内层次上的国家—民族均衡为自变量,地区国家的自由主义相容性为干预变量,地区战争与和平的类型为因变量,这些变量比较容易操作化。但是,这些变量是否存在过度简化的情况,尚需要探讨。

(二) 理论假说

冷战结束以后,对地区安全的研究倾向于把地区层次区别于全球层次,谋求构建一种地区的安全理论,因此越来越关注地区和国内因素对地区秩序的影响,米勒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路径的延续。

在划分“冷”和“热”两类地区秩序类型后,米勒开宗明义,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地区和国内因素是“热”结果的形成原因,全球因素则影响到“冷”结果。这其中包含着两层逻辑(见图-2),即热战/暖和平更多取决于地区国家的动机和利益均衡,而冷战/冷和平则更多取决于区域外大国的实力分配。第二,国家—民族不均衡是地区战争的根本原因。自近代以来,地区冲突多由民族主

米勒在书中一直强调地区和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参见 Benjamin Miller, *States, Na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s* pp. 18—20;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参见 Benjamin Miller, “The Global Sources of Regional Transitions from War to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8, No. 2, 2001, pp. 199—225.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义引起。特别是在民族成分错综复杂的地区,国家与民族之间纵横交错,往往引起利益纠纷和价值冲突,从而容易滋生改变现状的要求,引发地区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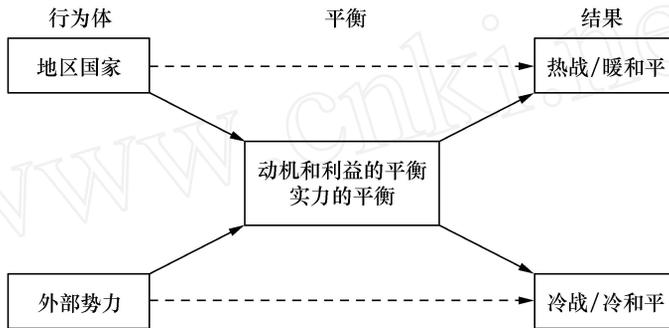


图-2 行为体、平衡和结果

来源: Benjamin Miller, *States, Na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Sources of Regional War and Peace*, p. 15.

在两个命题的基础上,米勒提出了五个核心论点,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建立了相应的因果关系。

假说一:特定地区的国家—民族不均衡和大国竞争综合作用,会引起地区冷战或者热战。这一假说主要涉及两个自变量,即国内层次上的国家—民族不均衡和体系层次上的大国竞争。在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地区秩序的常态结果就是冷战,并且时常伴随着热战。所以其因果关系为:国家—民族不均衡 + 外部介入(大国竞争) 热战/冷战。

假说二:在国家—民族不均衡的地区,霸权主导或者大国合作可以减缓冲突,能够带来地区的冷和平。这一假说的因果关系可以表述为:国家—民族不均衡 + 外部介入(大国合作或霸权) 冷和平。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国家的国家—民族关系仍然是不均衡的,但是如果大国之间存在合作,即使地区内的国家之间兵戎相见,通过各国协调妥协,地区冲突往往比较容易解决。所以,国家内部不契合成为冲突的主要原因,而外部的介入反而成了控制冲突的一个因素,所以地区秩序倾向于冷和平。

Benjamin Miller, *States, Na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s*, pp. 63—78.

假说三:如果没有外部干涉,地区的民族—国家不均衡会引起地区国家之间的热战或者冷战。米勒指出,绝大多数地区战争都是由地区国家而非大国挑起的,而国内的国家—民族不均衡往往会引起地区战争。从这一论点来看,一国的内部缺陷往往是地区战争滋生的温床,特别是弱国家的存在,使得地区内部矛盾丛生,并可能为外部干涉提供了可能。

假说四:一个地区成功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和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有益于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并且能使地区通向正常和平。这一假说的因果图式为:国家—民族均衡→常规和平。国家—民族均衡的实现需要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提高国家凝聚力。民族—国家之间均衡的结果有三个:地区国家修正主义的衰退;国家对社会汲取资源能力的增强,民族分离主义衰弱;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会增强。

假说五:自由主义的相容性有益于国家—民族问题的解决和超越,并很可能产生高层次和平。在外部没有干涉的前提下,如果国家—民族均衡,并且各国都是自由民主国家,那么这个地区的领土纠纷等问题就会变得微不足道,由此也就产生了高层次和平。所以,其因果关系为:国家—民族均衡+自由民主国家→高层次和平。

综合以上五个假说,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民族是否均衡和大国介入的类型对地区是否战争与和平密切相关。通过两个简单的自变量与一个干预变量,米勒揭示了不同层次地区战争与和平产生的规律。米勒的研究将来自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变量统合起来,置于一个单一的理论框架下,通过严密的理论检验证明其理论的有效性。

(三) 理论检验

案例研究是检验本书理论假设的方法,而且案例的选择是基于自变量的类别。为了验证不同的理论假设,本书选取了四个地区、五个案例:第一个案例以中东地区国家—民族不均衡来解释中东地区的战争倾向;第二个案例分析二战后大国介入的类型对中东地区战争与和平的影响;第三个案例考察国家—民族

Benjamin Miller, *States, Na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s*, chapter 4—8

不均衡与大国介入对一战前巴尔干地区的影响;第四个案例是探讨二十世纪的南美国家如何转变为维持现状;第五个案例是二战后的西欧地区融合。

从自变量的角度来看,第 1、4、5 个案例的核心变量是国家—民族均衡,第 2 个案例的自变量是大国介入的类型,第 3 个案例则检验国家—民族不均衡与大国介入的综合作用对地区秩序的影响。从因变量的角度来看,第 1、2、3 个案例检验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由于国家—民族不均衡及其大国竞争造成了地区长期动荡,而第 4、5 个案例则是以南美和欧洲为例检验一个地区形成常规和平和高层次和平的因素。这些案例的选择有着很大的代表性,以巴尔干地区为例,这个地区民族组成复杂,各个民族杂居在一起,掺杂着宗教、领土等矛盾,巴尔干一直是地区冲突的重点区域。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初,巴尔干更是成为大国争夺的重灾区,加之其深刻的内部矛盾,巴尔干的地区冲突直接导致一战的爆发。冷战期间,地区矛盾被大国矛盾掩盖。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退出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巴尔干地区面临着势力真空的危险,地区矛盾激烈,并导致了科索沃战争。

在米勒的案例研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变量控制。在第 4、5 这两章中,米勒分别对中东地区的国家—民族不均衡和大国介入的类型这两个自变量进行了检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研究中保持一个因素不变,然后考察另一个变量。只有控制变量,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发现因果关系,防止自变量的混淆。米勒的选择案例,从高度不稳定的中东到和平繁荣的西欧,依次递进,检验本书的五个假说。通过分析,米勒用学术界最常用的五个案例检验自己的理论假设,并将其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之内,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难度的工作,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对现实问题的驾驭能力。

三、米勒分析的局限

米勒的分析属于跨层次研究,在兼顾大国作用的同时,着重分析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契合程度对地区战争的影响,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理论模式。这一新颖的研究路径有利于我们理解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丰富了地区冲突研究的视角。但是,米勒的分析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米勒忽视了一些经验的反常,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反例就是冷战后东亚维持了高度的和平。东亚是一个情况复杂的地区,国家和民族纵横交错,一国内部存在多个民族和一个民族散布于多个国家的情况普遍存在。而且,各国的国家—民族契合程度并不高,各国领土纠纷仍然非常严重。然而,自冷战结束近20年以来,东亚维持了高度的和平。

针对这一现象,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为“非均势核威慑论”,秉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在东亚地区,尽管各国之间的常规力量对比处于非均衡状态,但是各国通过自身或者借助盟友获得了战略核威慑的能力,使得各国必须为自我生存而考虑,这种“非均势核威慑”保证了霸权国与地区大国之间、地区大国之间及其地区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和平。第二种观点是“中美地缘均势论”,即中国在东亚大陆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形成了相对均势,中美压倒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各自地缘区域内的和平秩序奠定了基础。第三种观点是“大国地区合作论”,有学者认为,东亚和平的维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东亚地区主要大国之间的合作和协调。

与米勒强调国家—民族是否均衡相比,以上三种解释更加强调国际结构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东亚能够保持高度的和平,既有体系层面的因素,也有国家层面的因素。并且,以上两类解释都很少涉及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东亚国家的观念转变。其实,造成地区战争与冲突的因素在东亚仍然存在,但是这些国家如何认知这些因素,还要取决于各国秉持何种观念。就米勒的研究而言,东亚为什么会维持长时间的和平是其中的一个理论盲点,要想更好地解释地区战争与和平,就必须解决这个理论反常。

其次,国家—民族均衡和民主化很难保证各地区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米勒把自由主义的相容性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并坚持认为如果国家—民族均衡和自由民主国家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那么战争将变为不可想象,这个地区将产

代表性论述参见阎学通:《东亚和平的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8—14页。

罗伯特·罗斯:《美中和睦:大国政治、影响范围与东亚和平》,《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第4—10页;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p. 81—118.

孙承:《大国关系与东亚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4期,第24—29页。

生高层次的和平。就理论逻辑来说,米勒陷入了民主和平论的窠臼。在他看来,目前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为人类未来树立了标杆,其他地区如果想消除战争,走向和平之路,就必须推动非民主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然而,米勒谋求永久和平的抱负既无法在理论上论证,也难以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第一,就理论建构来说,米勒没有很好地弥合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鸿沟。米勒谋求打通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隔阂,添加了自由主义的相容性这一干预变量。但就理论建构上来说,米勒的理论仍然存在明显的漏洞,如何更好地弥合这几个阶段的过渡,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在理论抽象的过程中,米勒只看到了欧洲通向自由主义的结果,却忽视了整个过程,欧洲能维持今天的和平固然有自由民主的贡献,但是却不是唯一的原因,欧洲也曾经经历了“火与血”的长期考验。

第二,就现实世界来看,米勒地区永久和平的理论难以被现实世界验证。如果国家间安全资源稀缺的状况没有改变,地区永久和平就只能是空想。永久和平是国际政治法制与秩序的最高阶段,是一种保证各国平等自由的和谐状态,然而它仅仅是人类的一种理想。永久和平是一种不可知的状态,任何地区都无法保证永久和平。即使当今最为和平稳定的西欧和北美地区,也难以保证这种状态会长久维持。相反,如果西方国家谋求把保证永久和平当作一种政策宣示,强行推广西方的价值观,反而是滋生地区冲突与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人类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国际政治的本质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安全资源稀缺的窘境仍将继续困扰着人类。

第三,国家属性的变化难以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米勒对人类历史的进步深信不疑,他认为国家属性的变化可以实现地区和平,消除地区战争。从西方的演进历史来看,不管城邦国家、帝国,还是现代国家,都没有消除地区战争,国家属性的变化仅仅引起地区战争的形式和方式发生了变化,人类团体之间仍然存在冲突的现实并没有变化,地区战争产生的逻辑与以往也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当今的国际政治特征与修昔底德的时代并没有本质不同。人类谋求通过自我理性控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邓正来、乔娅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 230页。

制社会,通过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家以根除战争是否能符合预期,这也是一个很难检验的命题。米勒在本书中的逻辑分析也无法验证这个命题。

再次,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只能减缓地区战争,而不能保证地区和平。米勒在本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国家—民族契合程度低的结果是容易产生秉持修正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从而推动国家改变现状,引发地区战争。由于国家有强弱之分,国家—民族契合程度有高低之别,所以这两个因素造就了四类国家:强国家与国家—民族契合塑造了维持现状国家,这些国家以欧洲北美为例;强国家和国家—民族不契合的结果就是修正主义国家;弱国家和国家—民族契合的综合作用产生了边界国家(frontier states);弱国家和国家—民族不契合产生了“不一致国家”或者“失败国家”。在此基础上,米勒提出了第四个假说,即成功的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能够导致地区和平。

成功的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是否能保证地区和平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两方面。第一,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冲突与矛盾的进程。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是一个国家政治社会整合的进程,这个进程中往往伴随着经济文化融合,甚至是政治控制和军事征服,因此时常发生流血和冲突。当前西方谋求输出价值观,以自身的价值观改造世界,这种推动西方式民主的努力,往往会引起他国的反抗,从而增加了地区冲突的可能性。第二,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只能消除内战引起的地区战争。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积极作用主要是国家组织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增加和国家能力增强等,这些因素可以增加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和弹性,进而增强政治稳定。因此内战爆发的几率将

Benjamin Miller, *States, Na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s*, pp. 57—61.

米勒认为国家建设包含两个过程,一个是地区分离主义的式微,另一个是国家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增强,民族建设则是一个民众对国家忠诚增加的过程。参见 Benjamin Miller, *States, Na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s*, p. 71; 关于民族建设更多的探讨,参见 Jochen Hippler, ed., *Nation-building: A Key Concept for Peaceful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trans. Barry Ston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Francis Fukuyama, ed., *Nation-Building: Beyond Afghanistan and Iraq*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Cynthia A. Watson, *Nation-Building and Stability Operations: A Reference Handbook* (Londo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关于国家建设的文献,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Jochen Hippler, "Violent Conflicts,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Nation-building: Terminology and Political Concepts," in Jochen Hippler, ed., *Nation-building: A Key Concept for Peaceful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p. 6.

明显减少,内战引起地区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冲突也会大为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间的冲突会减少。

综上所述,米勒的主要问题是过度裁剪。导致地区战争的原因多种多样,并往往伴随着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过度简化变量往往缩小了理论的解释力,增大了理论的片面性。

四、一些思考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国际体系的变迁,地区安全研究的议题也随之发生转移。特别是“9·11”以后,世界局势发生变化,新的议题逐渐出现。冷战期间,地区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区冲突、军事安全等传统领域。冷战后,经济安全、环境安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逐渐凸显。然而,学术界对地区安全的研究仍然存在三个主要不足。首先,西方国家主导当前研究的话语权。西方国家掌握着设定研究议题的主导权,其他国家只能尾随这些研究议题。例如,美国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称之为“失败国家”,对此加以鼓吹,使之成为“问题”,并提出改造这些国家的药方,推动各国的民主化。其次,地区安全的理论研究过度追随美国的战略转变。特别是“9·11”以来,随着美国对外战略的转变,学术界尾随其后,因而反恐成为研究地区安全的一个重要议题。而中国的地区安全研究往往不加甄别地附庸于西方的议题,缺少学术根基和独立意识。第三,新议题的理论化程度不高。冷战后出现的新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原有研究的范围,但是这些新的议题往往理论化程度不高,理论沉淀不敦厚,所以需要更多的学术积累。

米勒的研究也留给我们一些有待于深化的研究议题和领域,例如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如何影响地区战争与和平?进行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时,一国如何跟大国互动?地区如何实现由战争向和平的转变?对中国学者来说,地区安全研究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设置自己的研究议题,树立中国的话语权。其次,研究西方推行的民主化与地区冲突之间的关系,检验西方主张的核心命题。第三,加强对自身相关的地区安全研究,莫立学术根基。笔者相信,有关这些问题的思考,必将推动中国地区安全研究的深入发展。

作者简介

聂宏毅 199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工程学院获电子工程学士学位,200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获军事战略学硕士学位。2002至2004年在总参谋部办公厅工作。2008年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反制高技术主战兵器招法》(合编,2001年)。

电子邮箱: nhy04@mails.tsinghua.edu.cn

李彬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1985和1988年在北京大学分别获技术物理学士和硕士学位,1993年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1993—1999年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军控室工作,1999年8月至2000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工作。最新著作为《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2006年)

电子邮箱: libin@mail.tsinghua.edu.cn

尹继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200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2006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访问研究。

电子邮箱: benyin109@163.com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1982年在黑龙江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著有《国际关系分析》(2008年)、《中国崛起及其战略》(2006年)、《国际政治与中国》(2005年)、《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2001年)、《中国国家利益分析》(1996年)。

电子邮箱: yanxt@mail.tsinghua.edu.cn

黄宇兴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本科生。2006年作为交换生在香港大学学习。

电子信箱: hyx05.tsinghua@gmail.com

宋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2003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2007年获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译著有《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合译,2005年)。

电子信箱: pkusongwei@yahoo.com.cn

左希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2007年在南开大学获国际政治学士学位。

电子邮箱: zuoxiying@gmail.com